

◀ (上接 12 版)

点的著论。《论稿》第一章“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晚清胜流”，如题义所示，是为研究其家学传统和学术渊源，《陈宝箴和湖南新政》的首章与此篇之第一节有所重合，其余则完全不同。此章的特点，一是引用所能见及的有趣的资料，补充了陈宝箴、陈三立父子与郭嵩焘的知遇与交谊；二是对义宁之学的渊源和学术宗旨有独家的阐发。我发现，从陈寅恪的曾祖父陈琢如开始，到祖父陈宝箴，到父尊陈三立，都一以贯之地宗奉阳明之学。此节文字曾在1994年9月举行的“阳明心学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上宣读，刊于2001年第2期《读书》杂志。被当代阳明学的护法蒋庆兄推举为首创斯义。全文则刊载在2002年《中国学术》第3期。收入本书前，又经过两次改订增补，第四节“陈宝箴的阅历陶熔和志行名节”和第五节“义宁之学的诗学传统”，均为后来所增写，文字也由当初的两万字扩充至三万字。陈寅恪一再标举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可以从陈宝箴、陈三立的志行名节中找到家世信仰的熏习源头。

《论稿》第二章《陈寅恪的“家国旧情”与“兴亡遗恨”》，是对陈寅恪诗作的研究。义宁之学本来包含有诗学部分，第一章对陈宝箴和陈三立的诗作，已有所评鹭。散原固是同光诗坛的翘楚，而其诸子亦皆有诗传，尤其寅恪先生之诗作又自不同。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著《寒柳堂集》，附有《寅恪先生诗存》，所收陈诗远不完善。1993年，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《陈寅恪诗集》，是为当时编辑陈诗最称完备的文本。细详之下，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，即“家国”、“兴亡”、“身世”、“乱离”这些语词，反复出现于《诗集》之中，似有一唱三叹之致。于是作了一次研究取样，从《诗集》里找出包含有“家国”的诗句八例，“兴亡”二十一例，“身世”九例，“乱离”八例。并发现寅恪先生1965年写的《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》，具有特殊的题旨义涵，特别其中的“家国旧情迷纸上，兴亡遗恨照灯前”两句，可以看做是陈寅恪先生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曲。以此，才以《陈寅恪的“家国旧情”与“兴亡遗恨”》为题，撰写了此章文字，始刊于《中国文化书院建院十周年论文集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出版，之后虽经《光明日

报》选载一个整版，看到全文者实甚少。但在《陈寅恪诗集》出版当年的8月16日，清华大学曾开过一次《陈寅恪诗集》学术座谈会，我应邀出席，并在发言中就陈诗中的“家国”、“兴亡”等四组关键词作了取样说明，大家甚感兴趣。周一良先生与会，他对我的研究表示认可。文章写就十年之后，即2014年，又对此稿作了一次增补，收入本书的此章即为增补后的文稿。

第三章《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》，写于2006年7月，首刊于《学术月刊》2007年第6期，意在对比义宁之学的八个骨立之点，作一次论纲性质的归结说明。其中第四节“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”，是为第一次提出，被心系义宁的一位友人誉为概括精准。而第八节“陈寅恪的‘哀伤’与‘记忆’”，则是对论陈诗章的补充论证。当我反复诵读寅恪先生诗作的时候，分明感受到作者有一种深层的哀伤充溢于字里行间，以至于不断有哭泣、吞声、泪流的诗句，反复出现于《诗集》之中。我作了一番统计，发现此类诗句竟有二十六例之多。而任何“哀伤”都与已往的记忆有关。对陈寅恪而言，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在戊戌政变中遭受的打击，包括两年后祖父被慈禧赐死，是无法忘怀的记忆。作为史学家，他自然还会想到，假如当年的维新变法能够按义宁父子的稳健思路行进，就不致有后来的越出越奇的无穷变乱了。所以他越思越痛，痛上加痛，便不由自主地写下了“死生家国休回首，泪与湘江一样流”、“儿郎涑水空文藻，家国沅湘总泪流”等直接发愤抒愤的诗句。陈三立《散原精舍诗》中，也有诸多“家国”并提的抒怀感发之诗句，我从中找出“百忧千哀在家国”、“旋出涕泪说家国”、“十年家国伤心史”等近二十组诗，每首都不离“家国”。本章之撰写，开辟出义宁之学研究的新思路，使笔者往寅老精神世界的深处又递进了一步。

第五章是对陈寅恪晚年的大著述《柳如是别传》的专项研究。此章文字最早的稿本写于1989年的年底，《中国文化》1990年第3期刊载。十年之后的2001年5月，“中国近代史学思想和历史写作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召开，我应邀出席此会并以《“借传修史”：陈寅恪与〈柳如是别传〉的撰述旨趣》为题，作为提交和在会上报告的论文。这是在原稿基础上，经过改订重写过的专篇论著，篇幅

亦扩充至近三万言。研究义宁之学，再没有比对《别传》的评价更分歧的了。老辈如钱锺书先生、李一氓先生，都不特别看好此著。我的看法大异与此，而是认为《柳如是别传》是寅老一生最重要的著述，其学术目标则是“借传修史”，即撰写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。这一看法当1989年撰写此文初稿时，就明确提出来了。后来，随着自己研陈的逐渐深入，持论益坚。一次在答友人论《别传》的信函里写道：“我对《别传》评价极高，认为那是大史家一生最重要的著述，其史法、义蕴、体例，可视为近代以来史著的最高峰。无人能比，无人可及。斯为‘借传修史’之创体，所修者盖明清文化之痛史，亦思想之史、政治之史也。寅老一生心事学思尽在《别传》一书中。”职是之故，此章在本书中的地位，应居于特别之位置。

第六章的《陈寅恪与〈红楼梦〉》，写于2000年，刊载在2001年《文艺研究》第一期上。此章的写作由头，是缘于陈寅恪与红学家俞平伯的关系。他们初交于上世纪20年代的清华园。寅恪先生请俞平伯为之书写韦庄之《秦妇吟》，平伯先生请寅恪为其祖父俞曲园的《病中呓语》撰写跋语，所谓倾盖之交，由此开始。因之，当1954年俞平伯遭受无妄之灾时，寅恪先生禁不住发声了。这些故事由于缘合于笔者的研究范围，禁不住手痒，便撰写了此文。连带也将寅老在各种著述中随手援引《红楼梦》故事以为参证的例子，一并搜罗起来，加以贯串论说，使得此文读起来饶有趣味。巧合的是，台湾大学的刘广定教授，我的多年的好友，也写了一篇同题论文。题虽同，引例也难免重合，但写法绝无重合之处。恰合于寅老在《论再生缘》中所说的，他与陈援庵先生抗战时期人各一方，所考证杨玉环“人道年月”，结论竟“不谋而合”，但“两人俱无抄袭之嫌疑也”。广定兄的文章收入其《化外谈红》一书时，附记了此一往事（刘广定著：《化外谈红》，台北大安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34页）。“化外”者，盖由于广定先生是研究化学的专家，以此自谦也。我此次将《陈寅恪与〈红楼梦〉》编次收入本书，内容又作了许多增补，特别《论再生缘》中的涉《红》部分，系重新写过。因此该章之呈现，可以说是既为旧观亦非复旧观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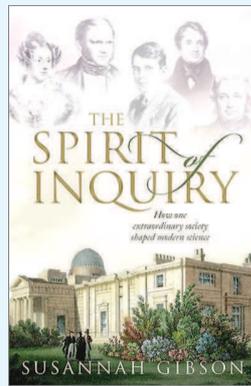
第七章《陈寅恪与王国维和吴宓》，初稿成于1992年，开始陈吴单独成篇，曾连载于香

港《明报月刊》。后来《吴宓日记》正、续编出版，有了更多的可资依凭的原始资料，于是经修改、增补，又于2013年重新定稿，在《中国文化》2013年秋季号刊出全文。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，王、陈的关系自是不同一般，故陈的《挽词》以“风义生平师友间”状之。而吴宓则是陈的终生契友，亦为静安先生所信任。王遗囑：“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。”可见王、陈、吴三人关系之全般。此章之作，盖为研陈所不能少。

第四章《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“判教”》是为新写，两月前方竣稿，还没有发表过（《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“判教”》一稿，蒙《中华读书报》编者慧识，破例以三个整版的篇幅于2016年9月14日刊出，在此特表谢忱）。但此章的重要，在于此题未就，《陈寅恪论稿》便没有资格出书。我一再申论，陈寅恪的史学带有文化史学的特点，其选题论域之要旨，实在我国古代的思想和制度。于魏晋主要是思想研究，于隋唐主要是社会制度和制度文化的研究。抽稿《陈寅恪的学说》第五章于此义阐述较详，并就种族与文化的关系揭示义宁学说的学理发明。本章今次对斯义又有所补论。更主要的，陈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思想主干儒、释、道三家都有极明晰的断判，于儒家则说：“儒家非真正之宗教，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。”于佛教则说：“凡新儒家之学说，几无不有道教，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。”于道教则说：“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，然其所弹精致意者，实仅人与人之关系。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。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。”于三家综论则说：“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，有所创获者，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，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。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，乃道教之真精神，新儒家之旧途径。”笔者固陋，不知海内外之学人还有谁何之论三教，能有如是之创发明断而又深具历史哲学之义涵。因此不得不收视凝心，固化一段时间，专门撰写此章，以补前此之所未及者。此章写就，则《陈寅恪论稿》可以付梓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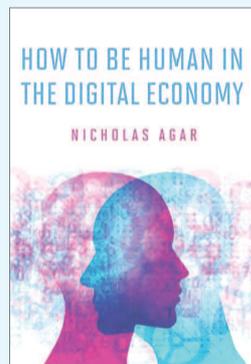
附录之两篇文字，一是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序》新释，一是对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》的诠释，都单独发表过。因与书中有的章次不无重合之点，故以附录的形式单存另列。（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院馆员。本文为《陈寅恪论稿》序）

## 一周英文新书



《探究精神：一个非凡的社团如何塑造现代科学》(Susannah Gibson, 牛津大学出版社)

尽管规模不大，但创办于1819年的剑桥哲学学会创造了一个辉煌的历史。它的成员有很多是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的伟大科学家，包括查尔斯·达尔文、查尔斯·巴贝奇、玛丽·萨默维尔以及劳伦斯·布拉格。它的故事从微观上反映了过去200年来，英国及周边的社会科学的急剧变化。作者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剑桥里人物的斗争和命运变化，并据此捕捉了现代科学兴起的轨迹。



《数字化经济时代，如何为人》(Nicholas Agar,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)

作者担心数字化革命在给我们带来新技术的同时，也带来数字化经济体系，这一经济体系会对依赖人类智慧的许多“脑力劳动”产生影响，进而威胁到整个人类社会体系。

Agar在书中提到了一个解决方案，即建立“社会—数字混合型”经济模型。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效率，而社会经济的价值在于人性。社会经济建立在人类心灵与智慧的交流上。Agar认为在涉及人与人直接接触的工作中，我们应该拒绝自动化的替代。在这个混合型经济模型中，人类应该致力于更多“心灵导向”的工作，而机器则可以集中在大量数据处理的工作。